

留学生群体的早期分化与救国道路的探索

安宇^{1,2}

(1. 江苏师范大学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江苏 徐州 221008; 2.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3)

[关键词] 晚清民初; 留学生群体; 分化; 探索

[摘要] 晚清民初, 为探索救国之路, 留学生群体呈现纷杂多样的政治取向。晚清时期, 他们大体上经历了洋务运动时期厕身清廷的有限忠诚、清末新政时期立宪与革命的分野和辛亥革命爆发后抛弃清王朝的三个阶段。民国成立后, 国内局势复杂多变, 分散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留学生根据现实的变化, 并依据自身的资源和见识, 在革命剧变期间尽力保存、扩展革命果实, 或关注经济致力实业, 或积极从事政党政治。袁世凯复辟帝制后, 除极少数留学生依附袁氏外, 大多数留学生仍然坚持共和, 最终结束了袁世凯的统治。在艰难地推动民初政治现代化转型的同时, 留学生们或致力于经济建设, 践行实业救国; 或献身教育领域, 推动了教育制度的革故鼎新; 或在更深层次考虑文化根源和国民性问题, 吹响了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号角。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425(2013)01-0001-12

晚清民初, 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动荡与发展的转型时期, 留学生在反对列强, 求得民族独立, 推翻清王朝, 结束封建帝制的复杂多变的政局中, 为探索救国之路, 他们依据自身的资源和见识, 作出不同的抉择, 演绎各自的角色,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描述他们的活动轨迹, 探讨其历史贡献, 即: 晚清时期留学生在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三个重要历史阶段的政治活动轨迹; 宣统退位、民国成立后, 留学生群体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政治分化; 袁世凯称帝后归国学人的抉择; 民初, 部分留学生在实业、教育、文化领域救国之探索。不妥之处, 敬请方家指正。

一、早期留学生的政治轨迹

近代以来, 英、法、美、日、德、俄、奥匈等列强不断入侵中华大地, 国门大开, 中外经济文化交汇也随之日渐深入。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 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在容闳等人的倡导下渐成风气。作为一个新生群体, 他们在清末民初的巨大变革中成

为影响政治时局的一种新势力。晚清留学生的政治取向纷杂多样, 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 厕身清廷的有限忠诚

鸦片战争后, 虽然晚清的政治统治危机频仍, 但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文人阶层对清廷还是普遍地持支持态度。作为由传统士子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变的文人集团——海外归国学人, 在很长时期内选择在清廷体制内任职, 为晚清统治的延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 因为留学经历导致的文化变异, 这些留学生淡化了传统士大夫的盲目忠君色彩, 相对于清廷而言只是有限忠诚。

1854年, 素有“近代中国留学第一人”之称的容闳自耶鲁大学毕业后, 带着“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的信念踏上回国之路。回国初期, 在爱国强于忠君意识的指导下, 他没有立即进入晚清朝廷的体制内。经过数十年的奔波和反思, 容闳以投身洋务运动为契机, 1863年进入曾国藩幕府。在尔后二三十年间, 容闳因购买“制器之器”、主持幼童留美等事而获得功名, 成为清廷体制内的特殊分子, 其思

[收稿日期] 2012-02-26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度重大项目“中国留学生与民国社会发展”(项目编号: 06JJD770014)、2009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留学生与五四文学运动”、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留学生视角: 20世纪初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与文学的变革”(项目编号: 10BZW081)、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项目“民国时期留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 11&ZD101)成果之一部分。

[作者简介] 安宇, 男, 江苏丰县人, 江苏师范大学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历史学博士。

想和行动在无意中具有了一定的忠君色彩。

1881年,被容闳视为“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5]的幼童留美教育被迫中断,除了少数提前回国或在美夭折的幼童外,90余名留美幼童分三批回国,头批21名幼童均送天津电报局学电报,第二三批内有23名被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其余50名经考核“分拨天津水师、机械、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6]。在尔后数十年间,他们在洋务派铸就的体系内“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为晚清中国的近代化转型做了许多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最终“强半列身显要,名重一时”^[7],成为促进晚清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幼童留美之后,清政府又派出了三批共80余名福州船政学堂学生留学欧洲。这些学生归国后,清政府依据留学期间的成绩和留欧监督的推荐,皆给予一定的官阶或军职,陆续被各省机器局、船坞、路矿、电报等部门争相罗致,成为晚清海军、船政、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等事业的重要力量。其中严复被李鸿章“辟总教习于天津水师学堂”^[8]。此外,严复翻译西方巨著11部,计170万余字,开创了中国翻译史上的新纪元,推动了西方思想政治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如梁启超后来所言:“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影响者,复其首也。”^[9]

(二) 立宪与革命的分野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廷完全蜕变为“洋人的朝廷”,国人对清廷的认同和支持率大幅度下降。“百日维新”失败后,立宪和革命逐渐成为晚清苟延残喘背后的两大政治潮流,早期的留学生群体也抛却了有限忠诚,在政治态度上出现了转化和分野。

20世纪初,清廷迫于压力和时势,陆续实行新政和立宪,相当一部分海外归国学人参与其中,为之推波助澜。伍廷芳、温秉忠、唐绍仪、黄开甲等留学欧美的学人在晚清政府大员袁世凯、张之洞、载沣等幕下办理一系列具体事务,可谓晚清立宪活动的骨干力量。蒲殿俊、汤化龙、梁善济、林长民、吴景濂、雷奋、孟昭常等留日学人宣传西方政治制度,力求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实现富国强民的梦想,成为各地立宪运动的首脑人物。而留美幼童梁敦彦于1911年5月入选以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出任外务部大臣,成为晚清立宪政治的执行者和领导者之一。

然而,更多的留学生转向了清政府的对立面,

走上了共和革命道路。如留美的孙中山,早年受王韬、郑观应等人的影响,倾向于改良主义。1894年他上书李鸿章,认为“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10],但李鸿章没有理睬。上书失败后,他弃绝了改良中国的念头,萌发出用暴力推翻清廷的思想,和陆皓东等人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同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1]作为奋斗目标,正式开始其反清革命生涯。

维新变法失败后,容闳逐渐认识到在清廷体制内改良中国没有出路,意识到“中国根本之改革”已“不容稍缓”^[12]。1900年3月,容闳开始了解孙中山等人领导的反清革命事业。半年后,容闳与孙中山在日本长崎不期而遇,彻夜长谈^[13]。此后,容闳实现了由改良维新向共和革命的转变。20世纪初,留日大潮风起云涌,陈天华、邹容、宋教仁等众多留日学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出版《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等革命刊物,组织青年会、同盟会、日知会等革命团体,成为革命活动的主导力量。

(三) 抛弃清王朝的共识

1911年5月“皇族内阁”的成立和6月四川保路运动的爆发,让海内外国人对没落的清廷彻底失望。辛亥革命爆发后,绝大多数归国学人不约而同地产生了抛弃清王朝的共识:一方面,原来倾向革命的孙中山、黄兴等留学生出身的革命党人以摧枯拉朽之势,促成了各地纷纷独立的态势,从根本上瓦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唐绍仪、伍廷芳、王正廷、王宠惠等清廷体制内的归国学人也主动顺应时代潮流,在南北议和中否决君主立宪,奠定了民主共和的基调,直接否决了清政府继续存在的历史理由。同时,汤化龙、林长民等立宪派在经过三次请愿的艰难和皇族内阁的欺骗后,也纷纷抛弃了宣统皇帝,和各地革命党人一道纷纷独立,而后选择了袁世凯,影响了辛亥革命的最终走向。

二、宣统退位后归国学人的分化

1912年2月,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宣统皇帝黯然退位,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此时,失去共同敌对目标的各派人士态度各异,留学生群体因所处位置的不同出现了分化。

(一) 唐绍仪组建民国首任内阁,维护共和成果

南北议和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之后,组织南北

统一的临时政府内阁的问题立即被提上日程,据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记载:

在双方讨论袁世凯接任后第一任内阁问题时,同盟会坚持总理必须出自同盟会会员,总理通过之后,再由总理提出阁员名单,请参议院投票。在讨论此问题时,赵凤昌亦列席旁听……“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这国务总理必须是孙文、袁世凯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认为只有少川先生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会员,这是双方兼顾的办法。”凤昌这话刚说完,孙文、黄兴同时拍掌,表示欢迎绍仪入党,同时即决定绍仪为国务总理,此问题就这样圆满解决了。^[1]

唐绍仪(1860-1938),字少川,今广东珠海唐家湾人。1874年被选派到美国留学。1885年赴朝鲜,任袁世凯的书记官。1901年被袁推荐为津海关道,其间曾任外务部、邮传部侍郎等职。1904年,以议藏大臣身份与英国办理交涉,两年后签订《续订藏印条约》,成功地维护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1907年任奉天巡抚。1910年任邮传部尚书。武昌起义后,代表袁世凯到上海与革命政府进行南北议和。1912年3月30日,加入同盟会,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一员,同时奠定了他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的基础。

早在留学美国时,唐绍仪就“素受共和思想”^[2]影响,议和期间革命意识日渐增强。出任内阁总理后,他尽力维护共和革命的成果。一方面,组阁之时充分尊重革命党人的意愿,甚至替革命党人保存实力出谋划策。在南北双方关于陆军总长席位争执不下时,“因南军力争陆军总长非黄兴不可,唐遂劝袁改段祺瑞为总参谋长”^[3],主动提出把陆军总长的位置交给黄兴。3月29日,黄兴“力辞陆军部新任”^[4]后,唐绍仪又“向孙中山先生建议,用政治手段对付袁世凯……使黄兴担任南京留守,掌握南方军事,保全实力,以待变化”^[5]。由于唐绍仪的运作和促成,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成为名副其实的“同盟会中心内阁”。另一方面,他还力图摆脱袁世凯以总统身份直接插手政务的干扰,以求完全行使总理内阁应有的职责。他多次表示“责任内阁凡事要对国家负责,自己任总理也要对国家负责”^[6]。

除唐绍仪外,民初第一届内阁成员中还有刘冠雄、王宠惠、蔡元培、施肇基、陈其美、宋教仁等

6位留学生出身的人士。他们带着民主共和的信念,和唐绍仪一道燃起民初共和的一束微光,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辛亥革命的共和成果。

(二) 宋教仁的议会政治实践

南北议和成功后,相当一部分仁人志士一时彻底放弃了暴力革命的想法,组建共和党、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等政党团体,践行议会政治。一时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7]。唐绍仪内阁解体后,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归国学人转向议会政治,继续挽救共和成果。

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4年与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策动起义未遂后,流亡日本。1905年在东京参加同盟会,任《民报》撰述。1910年至1911年在上海任《民立报》主笔,7月与谭人凤等组织中南部同盟会,策动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反清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后,参与筹建临时政府。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5月在北京出任农林总长。唐绍仪辞职后,宋教仁也随之离开政坛,专心党务。

1912年8月,为了组成“强大真正之政党”,宋教仁力排众议,与留日学人张耀曾等联合统一共和党、上海国民党、国民共进会等党派,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国民党成立后,发表《国民党宣言》、《国民党规约》等,指出中国“既改国体为共和,变政体为立宪,然而共和立宪之国,其政治之中心势力,则不可不汇之于政党”,明确“吾党以求完全共和立宪政治为志也”^[8],即组织责任内阁,践行政党政治。

此后,宋教仁到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演说,为实现民主政治建立责任内阁而大造舆论。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揭晓,在宋教仁的主持和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占392席,而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票数已成压倒多数之势,宋教仁等人所推动的议会政治似乎指日可待。在北上途中他还到处发表演说,阐发时政,提出“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9],明确为组建国民党内阁、实行议会政治营造声势,甚至邀请谭延闿出任内务总长。遗憾的是,坚持独裁的袁世凯不容权力受到威胁,指使部下对宋严密监视和百般恐吓,并于3月20日夜将宋教仁刺杀于上海的闸北车站,辛亥革命前后的

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也宣告破产。

(三) 孙中山力主民生,致力于铁路建设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当日,他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发表演说“兄弟解临时总统之职,解职不是不办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要紧的事待着手的。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21]在这种信念的推动下,孙中山等部分留学生出身的革命人士,在清帝退位后的主要关注点从政治革命转向民生主义,即开展经济建设。

此后,孙中山周游各地,不断阐释民生主义,为通过经济建设而实现国家富强造势,重点强调国有经济和社会主义。4月4日,他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无资本界、劳动界之争,又无托拉斯之遗毒。国家无资财,国家所有之资财,乃百姓之资财。民国政府拟将国内所有铁路、航业、运河及其他重要事业,一律改为国有。”^[22]10日,孙中山在武昌十三团体联合欢迎会上说:“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23]5月4日,在广东报界欢迎会上,他发表演讲称“今后欲谋国利民福,其进行之方针,惟有实行提倡民生主义耳。”^[24]

在进行民生主义理论阐释的同时,孙中山也有意识地开始着手规划,投入到民初经济建设中去。4月17日,他出席上海商界的联合欢迎会,并应邀出任中华实业联合会会长。8月,北上会晤袁世凯,对接待人员说“此次北来,惟一宗旨在赞助袁大总统谋国利民福之政策。”^[25]24日,在第一次会见袁世凯时,面对“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26]的情势,他说“惟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27]这不仅明确指明了经济建设对解决时局的重要意义,更指出从修建铁路等交通设施着手开展经济建设的途径。在后来与袁世凯的多次会晤中,孙中山多次强调“我辈注重人民,须极力振兴实业,讲求民生主义,使我五大族人民,共浚富源,家给人足,庶民生有赖。”^[28]同时,劝袁世凯练百万陆军,修筑20万里铁路。基于孙中山对经济建设尤其是铁路建设的热情,袁世凯顺水推舟,遂宣布孙中山拥有“筹划全国铁路全权”。

此后,孙中山便全力投入到铁路建设中来,先

是专程前往八达岭、张家口考察京张铁路,并邀请詹天佑做他的技术助手,邀请马君武、徐谦协助他办理具体事宜。离开北京后,他一路南下考察北方的铁路建设。11月14日,他在上海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并通电各省都督及议会。1912年底,孙中山主持制定了《中国铁路公司条例草案》,派王正廷、徐谦前往北京送交参议院审议。1913年初,孙中山致函蔡锷,提出修建滇道(昆明至南宁)及滇粤桂铁路的设想,并制定出《滇粤桂铁路说明书》,详细阐明其政治、军事与经济意义,以及具体路线、筹款办法^[29]。2月14日,孙中山由马君武、戴季陶陪同到东京,考察日本的铁路技术,并筹集铁路资金。

另外,孙中山还逐渐形成了一个宏观的铁路建设构思。1912年6月20日,他在与上海《民立报》记者谈话时提出具体设想:

以吾策之,沟通全国之主干路,则有三条:一、南路:起点于南海(佛山),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二、中路:起点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超新疆而迄于伊犁。三、北路:起点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于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梁海……北路乃固圉之要道,亦破荒之急务,殖边移民,开源浚利,皆为天然之尾闾。^[30]

正在孙中山雄心勃勃地实施他的铁路计划时,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不断阻挠、破坏他的计划和实践。对此孙中山有所警醒,宋教仁被刺后,他中断了在日本的访问,与黄兴、陈其美等人商量对策,经过酝酿,最终认识到事已至此,只有起兵^[31]。于是,“二次革命”轰轰烈烈地爆发了。

总之,清帝退位后,大量留学生出身的革命党人似乎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或主持责任内阁追求现实的民主共和,或奔走于议会力求自身的政党责任内阁,或致力于民生经济建设,暂时都忽视了军事力量和暴力革命的重要性,南京留守黄兴也草草地终结了南方各军的历史。这种致命的乐观与盲目让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们的实践在袁世凯的权谋和北洋集团的军事压力下接连宣告失败。

三、袁世凯称帝后归国学人的抉择

宋教仁被刺后,袁世凯的真面目一步步地显露出来,日益走向独裁专制直至称帝。1915年12月,袁世凯恢复了君主制,建立洪宪帝制,行君主

立宪政体,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在此情况下,曾经留学国外的仁人志士在拥护、反对袁世凯方面又出现了一次政治分化。

(一) 支持洪宪帝制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迫使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后又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独裁制,并开始了复辟帝制的活动。一开始,袁世凯不敢正面提出实行帝制,而是设法制造舆论。对此,杨度等信仰君主立宪制的留学生走上了违背历史潮流的历史舞台。

对于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善于察颜观色的留日学生徐佛苏最先嗅到,并秘密呈请改行帝制,让袁世凯看到了所谓的民意,在起始阶段激发了他的称帝野心。而后,袁世凯又利用杨度进一步倒行逆施。杨度(1874—1931),原名承瓚,字哲子,后改名度,湖南湘潭人。“维新变法”期间曾参与公车上书,后来到衡阳东洲船山书院师从一代名儒王闿运,醉心于帝王之术。1902年,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受留日学生影响,思想日趋激进,逐渐成为与梁启超相提并论的宪政人才。杨度主张宪政,不介入保皇派、排满革命派的论争,辛亥革命后也拒绝加入同盟会。在立宪活动中,他得到袁世凯、张之洞的联合保荐,受到重用。由于和袁世凯私交颇深,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成为袁世凯的幕僚。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出台洪宪帝制的过程中,杨度更是亲力亲为,全力相助,成为袁世凯的重要智囊。

徐佛苏秘密劝进袁世凯称帝后,袁世凯授意杨度和徐佛苏等先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筹安会,并网罗一些名流参加,把它作为表达“民意”的机构,为帝制公开制造舆论。1915年8月14日,杨度和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严复联名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度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1]

同时,他们还联名通电各省将军、巡按使以及各公法团体“本会宗旨在于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研讨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2],邀请他们派遣代表到北京,共同商讨国体问题。宣言发表后,各省将军、巡按使纷纷派代表到北京,填写志愿书加入此会。筹安会发给会员每人表决纸一张,请其填写“君宪”或“民宪”二字,结果各省代表一致

主张“君宪”,于是该会又发表了第二次“君宪”宣言,认为“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3]。在该会的引导和运作下,各省旅京人士纷纷组织“公民团”,分别向参议院请愿,呈递该会代起草的请愿书,在10天内形成了大规模的“改革政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启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

另外,为了替袁世凯称帝更好地营造声势,杨度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为之摇旗呐喊。他认为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皆为共和之弊端所致。人民还不知道共和为何物,为此,他主张变更国体,实行君主立宪,并陆续向袁世凯引荐他的师友亲朋如王闿运、梁启超、蔡锷等人,以求更多的大名流支持袁世凯的复辟活动。然而,事与愿违,这些人反而出面责骂杨度为称帝帮凶,梁启超更是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与杨度的观点针锋相对。梁启超在该文中雄辩地阐述了反对变更共和政体的观点,尖锐指出杨度主张变更国体,其真实意图是为袁世凯实行帝制寻找理论根据,夺舆论之先声。该文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后,《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风行一时,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不过,直到帝制失败之后,杨度也并未因此改变其君主立宪的政治信仰。袁世凯死后,他写挽联说“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返,再平此狱;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4]在这里,他仍然认为君主立宪的主张和活动没有错,错在袁世凯自己没有好好地把握和运作,更埋怨袁世凯把恢复帝制的责任都推到了他头上。

(二) 继续革命的探索

清帝退位后,南方革命党人把民国总统职位让给了袁世凯,但为防不测,暂时保留了一部分军队,成立了南京留守府,曾留学日本的黄兴“为南京留守,仍统辖南洋各军”^[5]。随着袁世凯真面目的显露,孙中山、黄兴、蔡锷等留学生出身的革命党人逐渐从责任内阁、经济建设等方面转移到暴力革命上来,由此有了“二次革命”、组建中华革命党、“护国运动”等历史事件的发生。在这些活动中,留学生出身的政治家和军人,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1. 发动“二次革命”

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后,他撕破了脸皮决心以武力打击革命党人,并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以供军

费开支。1913年5月6日,袁世凯颁布“除暴安民”令,6月陆续罢免了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人的职务,且拟定军事计划向江西、安庆、南京等地进发。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黄兴等留学生出身的革命领袖也彻底走出犹豫的状态而明确武力反抗袁世凯的路线方针,孙中山指令曾留学日本李烈钧回江西策动独立,李烈钧即在上海发表《回赣讨袁致江西各界电》:

南昌总局曾总理,速转欧阳都督、行政公署、省议会、军界全体、商会、进步党、国民党、各公团、各报馆鉴:均密。袁世凯违反约法,蹂躏民权,破坏共和,实行专制,种种不法行为,难以枚举。兹复无故派遣重兵,扰乱赣省,实堪痛恨。烈钧养痍汨滨,痛念桑梓,特回赣随同军界诸君,省罪致讨,诸祈赐教。李烈钧。^[6]

此后,李烈钧从上海回到江西湖口,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于7月12日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发表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乘机窃柄,帝制自为,暗杀元勋,并髦约法,擅支巨款”等罪行,宣布这次起兵的目的是“保卫共和,驱除民贼”^[7],并力促上海和南京响应。15日,黄兴到南京发动当地驻军第八师宣布独立,发表讨袁宣言:“法律解决,既经无效,乃不得不诉之武力,作最后之解决”,表示要“努力驰驱,不除袁贼,誓不生还”^[8]。17日,柏文蔚在安庆发表独立讨袁宣言;次日,陈其美在上海通电宣布独立讨袁;同日,陈炯明在广东宣布独立讨袁;7月25日,湖南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

在各地纷纷独立讨袁之际,孙中山也营造舆论促使袁世凯退位。7月22日,孙中山通过上海《民立报》对外发表《告全体国民促令袁氏辞职宣言》,指出:

为公仆者,不以国利民福为怀,反欲牺牲国家与人民,以争一己之位置,中华民国岂容开此先例?愿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庶可以挽国危而慰民望。^[9]

同时,孙中山还致电北京众参议院、国务院、各省督军、民政长、各军师旅长等,“望以民命为重,以国危为急,同向袁氏说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10]。

当日,孙中山直接致电袁世凯劝其辞职,毫不客气地指出“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

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11]

面对各省独立反抗和孙中山的促袁退位宣言,袁世凯撤销了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督办的职务,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人,开始实行军事镇压。7月22日,江苏讨袁军在徐州地区与北洋第二军冯国璋部和张勋武卫前军会战失利,退回南京。7月22日至28日,上海讨袁军屡攻江南制造局未克,指挥部也被上海租界当局解散。7月28日,黄兴看到大局无望,于是离宁出走,讨袁军全局动摇。8月13日,拥袁的粤军龙济光部攻占广州。同日,湖南谭延闿通电取消“独立”。8月18日,北洋军李纯部攻克江西南昌。8月28日,倪嗣冲率兵进驻安徽安庆。9月1日,张勋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缉。至此,“二次革命”宣告失败,但以留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党人并未屈服。

2. 创立中华革命党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等留学生出身的革命党人被迫再次流亡日本,认真总结革命经验,继续探索救国革命道路。

孙中山经过长期思考,认为“不统一服从,实无事不立于败衄之地位,故鉴于前辙,兹乃力洗从前积弊”^[12]。从“二次革命”的失败中,他感到国民党组织严重不纯,人心涣散,已不能领导革命继续前进。于是,1913年秋,孙中山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组织一个坚强的“中华革命党”,以便更有力地拯救革命。为此,他对党员提出了极其严格的要求:

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孙中山)一人,毫无疑虑而后。若口是心非,神离貌合之辈,则宁从割爱,断不勉强,务以多得一党员,即多得一员之用,无取腐滥,以免良莠不齐,此吾等今次立党所以与前次不同者。^[13]

为了防止良莠不齐现象的发生,孙中山在开始正式发展党员之前,在东京建立了“亡命客救国团”,调查流亡在外的国民党党员,联络经得住考验的革命党人。1913年9月27日,朱卓文、王统等5人宣誓加盟,其中王统誓约如下:

立誓人王统,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痛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

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借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64]

此后,老同盟会员陈其美、戴季陶等人纷纷宣誓加入,到1914年4、5月间,已有四五百人加入中华革命党。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举行成立大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革命党总理,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中华革命党总章》,重申民权主义,提出“本党以扫除专制政体,建立完全民国为目的。”^[65]但是,中华革命党的一些规定,如有关的纪律带有帮会形式,要求加入者宣誓效忠于孙中山等,也引起了同盟会其他一些人的反对,黄兴等人因此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作为以留学生为主体的革命组织,中华革命党上述规定是明显不妥的。这是当时留学生出身的革命党人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消极总结和为加强革命党人纪律性的无奈之举。

在孙中山重新建党的同时,袁世凯正加紧其复辟帝制的步伐。对此,孙中山于1914年5月发表了《讨袁檄文》,义正辞严地指出袁世凯的罪恶:

今袁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会,而阉阉无安民矣;解散国会,而国家无正论矣;滥用公款,谋杀人才,而陷国家于危险之地位矣;假民党狱,而良儒多为无辜矣。有此四者,国无不亡!国亡则民奴,独袁与二三附从之奸,尚可执挺衔璧以保富贵耳……吾侪昔以大仁大义铸此巨错,又焉敢不犯难,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

最后,孙中山呼吁:

今长江大河,万里以内,武汉京津,扼要诸军,皆已暗受旗帜,磨剑以待。一旦义旗起,呼声动天地。当以秦陇一军,出关北指;川楚一军,规画中原;闽粤旌旗横海,合齐鲁以捣京左。三军既兴,我将与诸君子扼扬子江口,定苏浙,以树东南之威。掣庭扫穴,共戮国贼,期可指日待焉……正义所至,何坚不破?愿与爱国之豪俊共图之!

孙中山的《讨袁檄文》消解了部分民众对袁世凯的愚忠,从内部瓦解了北洋集团对袁世凯的如一支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

中华革命党组建之前,留在国内的陈其美、汪

精卫等留学出身的革命人士在上海、大连等地继续发动一系列革命活动。1913年9月初,陈其美、蒋介石潜赴宁波,“拟以宁波为根据地”,并派姚某等十余人前往杭、嘉、湖,“分头起事”^[66]。11月初,朱执信等曾潜回广东,筹备起事,但为敌探跟踪,只得暂返香港。这些活动因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呈现出分散无序的特点,很快被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各个击破。

中华革命党建立后,孙中山和党内领导人胡汉民、廖仲恺等陆续召开17次会议,商谈革命方略、建设中华革命军问题,最后制定出《革命方略》六编,进一步明确了中华革命党的革命宗旨:“推翻专制政府,建设完全民国”;在斗争方略上“以军事为先决”。在此基础上,留学生出身的革命党人发起了一系列反袁斗争。一是派人联络湖南、贵州、四川等地会党,发动农民武装举行反袁斗争;二是派人到一些地方军队中策动军队哗变或起义;三是在东北、山东、广东等北洋力量军事薄弱的地方,组织军事活动,重点发展力量;四是充分利用海外华侨力量,筹集经费,购买枪支弹药,运回国内支持武装斗争^[67]。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孙中山认为“刻下欧洲战乱,确为中国革命之空前绝后之良机”^[68],加紧了国内反袁的武装斗争,重点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发动一系列武装斗争。这一系列武装斗争以星星之火的姿态,引发出潜在的燎原之势,为后来护国、护法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3. 发动“护国运动”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活动达到高潮,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反袁斗争此起彼伏,最终酝酿出了留日学人蔡锷领导的“护国运动”,沉重打击了袁世凯的复辟之举。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市)人。1898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接受了维新思想,后入上海南洋公学。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先后入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武昌起义后,策动云南起义,出任“大汉军政府云南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69]。但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

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1915年，在袁世凯酝酿称帝之际，蔡锷在其师梁启超的帮助和策划下，潜回云南，于12月19日在昆明受到了云南都督唐继尧的热情接待。同日，蔡锷等人举行云南军事会议，决定起兵反袁。22日，召开讨袁动员大会，决定定名为护国军，推举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目标四川；曾在二次革命中主持江西独立的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目标广西。23日，他们致电袁世凯“此间军民，痛恨久积，非得有中央除帝制之实据”^[54]，明确要求取消帝制。25日，正式宣布云南独立讨袁：

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都统、镇守使、师长、旅长、团长、各道尹、各知事、各学会、各商会、各学校、各报馆公鉴：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輿情，自为帝制，率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大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逆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尧等身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露布之文，别电尘鉴……今若同申义愤，相应鼓桴，所拥护者为固有之民国，匕鬯不惊；所驱除者为叛国之一夫，天人同庆。造福作孽，在一念之微；保国覆宗，待举足之轻重。敢布腹心，惟麾下实利图之。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及军政全体同叩。

由此，揭开了护国运动的序幕。

蔡锷的反袁倾向和行为，一开始就得到了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他们会暗中派人与之联络并予鼓励。1915年9月底，蔡锷曾派人送密信给远在美国的黄兴，告知国内动态及南下反袁计划。对此，黄兴积极支持，他认为“此次讨逆，出于全国人心，理无党派意见，更无南北区域之可言。”^[55]于是通电全国，号召协力策进，务必清除祸害的本源。此外，他电促李烈钧前往云南参加起义，在海外筹集巨款支援国内。

护国运动爆发后，孙中山特别振奋，12月25日致电林森等人“五省合抗袁事，确有真信”^[56]，希望加紧筹款。1916年元旦，孙中山致电上海革命党人，要他们“现请竭力联陆军，海军当行王统之策，粤将发，鄂赣着速动，沪当图万全”^[57]。3月13日，又致函北方革命党人：“云贵军局于一隅，胜败之机，尚难预决。故欲缩短战争之期间，

保全国家之元气，事半功倍，犹解倒悬，非从袁氏根本地推翻不可。加之北方健儿，山东豪杰，并起亡秦，殆指顾间事耳。文实有鉴于此，特派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总司令，统筹直隶、山东、山西革命军进行事宜，前来与诸同志相见。务希各披肝胆，协力同心，义勇奉公，精诚服务，以达吾党远大之目的。文实有厚望焉。”^[54]孙中山不仅具体部署和指导了北方的反袁斗争，而且高瞻远瞩，看得更远，考虑到了整个反袁斗争的全局。

在云南护国军和中华革命党等革命派的遥相呼应中，贵州、四川、江西、广东、浙江、湖南等地纷纷独立，并且成功地击败了袁世凯的军事部署，使袁世凯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被迫在3月22日撤销“承认帝制案”。对此，孙中山致电上海革命党人，明确指出不要因帝制取消而放松反袁斗争，认为这只不过是“缓和人心之计”^[58]。5月初，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直接参加反袁斗争，再次发表《讨袁宣言》：

袁氏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此所以认为公敌，义无反顾。今是非已大白于天下之人心，自宜猛厉进行，无遗一日纵敌之患，国贼既去，民国始可图安。若夫今后敷设之方，则当其事者，所宜一切根据正确之民意，乃克有济。文自审立身行事，早为天下共见，末俗争夺权利之念，殆不待戒而已除。惟忠于所信之主义，则初不为生死祸福而少有屈挠。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唯父老昆弟察之！^[59]

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蔡锷等护国军主要领导人也清醒地看到了形势依旧非常险恶，联合唐继尧等人通电全国，不仅不承认袁世凯仍任总统，而且要求对袁进行审判，并提出三条具体意见：一、袁氏即日退位，听候组织特别法庭进行裁判；二、援引约法，请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三、从速召集被袁氏非法解散之国会议员，重谋建设^[60]。

接着，蔡锷以个人名义致电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迹者国家不幸，至肇兵戎，门庭喋血，言之痛心。此闻项城悔祸，撤消帝制，足副喁望，逃听下风，曷胜钦感。惟国是飘摇，人心罔定，祸源不靖，乱终靡已。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尚未能为项城曲谅，凛以往之玄黄乍变，虑日后之覆雨翻云，已失之人心难复，即堕之威信难挽。若项城本悲天悯人之怀，

为洁身引退之计,国人軫念前劳,感怀大德,馨香崇奉,岂有涯量?公等为国柱石,系海内人望,知必有以奠定国家,造福生民也。临电无任惶悚景企之至。 鐸叩^[5]。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告退位,复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蔡鐸及革命党人又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继续对袁穷追不舍,迫使袁宣布退位。遭此打击,袁氏病重,6月6日,以尿毒症而逝。

四、关注实业、教育、文化的发展

辛亥革命前后政局的剧烈变革,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清末民初社会发展的实现最终还要在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落实,而这些方面正是留学生关注的重点所在,一大批从海外归来的学人投入到实业、教育、文化等领域,由此推动了当时实业救国大潮的风起云涌,确定了新的教育制度,并且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一) 倡导实业救国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致力于富国强兵的同时也意识到发展民用工业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郑观应兴办实业,提倡“商战”,他认为发展商业能够富国,富国就能御侮,从而达到救国的目的,由此“实业救国论”初步成型。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重视民生,各地报刊竞相宣传“实业救国”,并提出国家振兴实业“要道”⁵条,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实业救国”思想。留日出身的张东荪即是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之一。

张东荪(1886—1973),原名万田,字东荪,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出身官僚家庭,少年时期他在西方思潮如万斛泉涌的时代,顺应新政鼓励学生出洋的政策和潮流,于1904年获得官派留学资格,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留日时期的张东荪,一方面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熏陶,开始进行初步的哲学研究;另一方面,面对国难日深的严重局面,也兴起了强烈的入世、救世之心。二者综合的结果是造就了哲学家全方位地探讨救国之路的努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实业救国思想。他认为,中国既然有贫乏病,那么开发实业就成为唯一的要求;在开发实业的要求下,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与日俱增,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要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增强国力,要增强国力就必须开发实业;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由于他对实业救国的坚守,与张謇一道被誉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实业救国论的代表人物。

与张东荪着重理论阐释不同,范旭东、陈光甫等是实业救国的实践者,他们分别在不同的行业里发展经济,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进步,践行实业救国的道路。

范旭东(1883—1945),又名锐,字行,我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被称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1900年,范旭东东渡日本留学,191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科化学系。次年回国,先在北洋政府北京铸币厂负责化验分析。但由于不满官场的腐败,他又远赴西欧考察英、法、德、比等国的制盐及制碱工业。回国后,他历尽艰辛,于1914年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在此基础上,为实现实业救国和发展化学工业的愿望,他又着力制碱工业,于1917年开始创建永利碱厂,开创了我国制碱事业。

陈光甫(1881—1976),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字光甫,以字行世。江苏镇江人,银行家。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同年回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银行监督。1914年转任中国银行顾问,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家,次年创办了当时中国最成功的私人银行——上海商业储蓄。

值得注意的还有留日出身的阎锡山,他在山西聚集了一批留学生,推进当地经济建设,是民初实业救国最为全面系统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孙中山民生主义最切实的实践者。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号龙池,山西五台人。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1909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历任山西陆军监督、新军标统,参加反清活动。武昌起义后被举为山西都督。由于留学日本,他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潮流,懂得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重要性,也爱护和重用人才,其政权核心中有不少留学生,如崔廷献、李庆芳、南桂馨、徐一清、陈受中等。他们志同道合,一起推动山西实业的发展。到抗战前夕,山西的农、林、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还创建了包括采煤、冶金、机械、化工、建材等门类齐全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860公里长的同蒲铁路;成立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这些都为山西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 践行教育救国

近代“教育救国”的本源始自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开端,容闳当年的留学教育梦想本身就是以新式教育取代旧的科举教育,培养出近代意义上的新人,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进而实现强国之梦,即留学教育救国。辛亥革命后,众多深知资产阶级共和国之真谛的留学志士对袁世凯的反动举措非常失望,看到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经过迷茫中的探索,部分先行者把目光转向了教育,致力于创建新教育体制,推动教育发生近代化质变,践行教育救国理论。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他对建立新的教育体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指导意见。他提倡普及教育制度,反对贵族教育制度,并且要求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办理。“要办普及的教育,令普通的人都可以受到教育……先办幼稚园,次办小学,再办中学,然后才可以办大学。……让人人能够读书,才可说是普及教育制度,若是不然,便是贵族制度,便是资本制度”^[5]。为此,他将“实施教育”列为同盟会的革命方略之一^[6]。他还特别注意女子教育问题,指出“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唯有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认为“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6]。孙中山的这些指导意见,确立了民初资产阶级教育体制的路向。

1912年1月3日,孙中山任命蔡元培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忠实执行并发展了孙中山确立的方针,成为建立民初新教育制度的实际掌舵人。1月25日,蔡元培主持教育部发布《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14条)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11条),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大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中学校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必分科”;“废止旧前奖励出身”^[6],废除了晚清教育制度中的封建残余,宣告了旧教育的结束和新教育的诞生,为民初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2月8日,他发表《对于新教育的意见》一文,批评清末教育宗旨的“忠君”与“尊孔”,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6],提出新时代的教育应该注重军国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和美育主义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否定了以培养科名仕宦之才的精英主义封建教育,向造就知识型人才的新教育体制转变,为民初年建立现代教育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建立新教育体制的过程中,蔡元培吸收了

大量留学生出身的人才到教育部,使教育部成为留学生的大本营。民初六个教育总长与次长蔡元培、范源濂、景耀月、董鸿祯、刘冠雄、陈振先等都有留学经历,而教育部其他职员,据他自己回忆:“一半是我所提的,大约留学欧美或日本的多一点;一半是范君静生所提出的。”^[6]而范源濂提出的那批人仍以有留学经验者为主^[6]。教育部中的这些留学生职员和蔡元培一道,主导了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的起草、议决和颁布,对民初现代化教育体制的初步建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三) 思想文化的清道夫

辛亥革命后在政治上的失败和落空,让很多人向往已久并为之奋斗的政体宣告流产。袁世凯的称帝行动更让有志之士悲愤和震惊。与众不同的是,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留学人目睹袁世凯、张勋之流的倒行逆施,在震动之余将思考的方向深入到清算奴性意识的文化根源上,正式揭开启蒙运动的序幕,奏响新文化运动的序曲。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号实庵,安徽安庆人。早年接受传统教育,1896年考中秀才。20世纪初,留学日本,参加安庆和芜湖的一系列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参与安徽独立,并起草独立宣言。失败后,陈独秀离弃肤浅政治,致力于伦理的解放。他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中说“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6]呼吁同胞们认识到“吾人于共和政体下,实备受专制统治之痛苦”^[6]的现实,劝他们放弃曾经信奉的和向往的爱国主义政治,从事这一“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陈独秀警告同代知识分子,要他们不要陷入政治困境,要求他们退出政治舞台,投身教育活动和道德改良。他呼吁世人从繁杂无序的政治纷争中走出来,以理性的自觉探讨文化深处的根源问题,用道德改良的方式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奠定基础。

与陈独秀的呼吁不同,后来以“鲁迅”之名誉满天下的周树人在整理国故中等待文化更新的机会。鲁迅(1881-1935),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曾考取南京水师学堂。1902年到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在留学期间和归国初期,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索,面对辛亥革命的失败,他认为中国的积弱积贫与长期改革但很少成效的原因,在于国

民性的落后羸劣;而这一国民劣根性之造成,则在于中国是“衰老的国度”,“废料愈积愈多组织变硬”,其文化即“旧文明”,“只会教人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因此,必须改革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他提出“立人”,“致人性于全”,要进行“思想革命”,在文化上“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即要进行中国文化的内在自我更新。基于此,民国初年鲁迅一方面带着与过去决绝的心态,埋首整理古代碑刻拓本的同时,等待着同道中人的到来。

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号疑古,浙江吴兴(今湖州)人。钱玄同幼年就接受严格的中国传统教育,打下扎实的古典学问的根基。后来留学日本,成为章太炎最得意的学生。1910年,钱玄同学成归国,短暂执教于海宁中学。袁世凯借助复古企图恢复帝制和张勋复辟两次丑陋的政治表演,导致了他思想发生了剧烈的转变,由一个复古主义者迅速转变为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其中的集中表现是由志在“光复旧物”转变到“废除汉文”。他说“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正是由于这种转变,钱玄同后来呼吁提倡白话文,积极为《新青年》杂志投稿,积极支持文学革命,参加国语研究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此外,他还劝说埋首整理古代碑刻拓本的鲁迅加入新文化运动,促使鲁迅放弃拓本研究而拿起笔,写成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新文学杰作《狂人日记》。

此外,这个时期孤军奋战的还有曾经留学日本的吴虞,胡适后来回忆吴虞当时的情景,称赞他

为整代人钦佩的前辈^[6]:

他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他把后蒙之水洒向那孔孟弥漫的大道上。因此时时被那无数吃惯孔孟的老夫子们跳着脚痛骂,怪他不识货。有时候他洒得疲乏了,失望了,忽然远远地觑见那望不尽头的大路的那一头好像也有几个人(陈独秀和其他人)在那里洒水清道,他的心里又高兴起来了,他的精神又鼓舞起来了。

1916年,留学欧洲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采取兼容并包的措施,将这些孤独的思想界“清道夫”聚集在北大,挑战北大乃至全国的保守势力,逐渐将新文化运动推向最高潮。

五、小结

综而言之,辛亥革命期间国内局势复杂多变,分散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归国留学生根据变化中的各种情势,依据自身的资源和见识,在革命剧变期间尽力保存、扩展革命果实,或关心经济致力实业,或积极从事政党政治。与袁世凯决裂后,这些留学生不顾身家安危,毅然走向继续革命的道路,最终齐心协力将袁世凯推向灭亡的境地,艰难地推动民初政治的现代化转型。而那些似乎在辛亥革命期间看透世事而远离政治纷争的留学生,或致力经济建设,践行实业救国;或献身教育领域,推动教育制度革故鼎新;或在更深层次思考文化根源和国民性问题,揭开中国短暂的启蒙运动的序幕,为稍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启动了历史的密钥。

参 考 文 献

- [1] [2] [3] [4] 容闳《西学东渐记》,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二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2、135、145、144页。
- [5] 光绪十年三月初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167页。
- [6] 参见王遽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页。
- [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 [8]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页。
- [9]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5页。
- [10] 参见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辛亥革命史料新编》(六),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 [11] 朱英《唐绍仪与辛亥南北议和》,暨南大学历史系、珠海市政协编《唐绍仪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150页。
- [12] 甘草移《辛亥和议之秘史》,柴德赓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辑),上海书店,1957年版,第116页。
- [13] 《大公报》,1912年4月6日。
- [14] 《时报》,1912年3月30日。
- [15]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 [16] 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 [17] 善哉(丁世锡:《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是》,1913年第1期。
- [18] 《国民月刊》,第一卷第一号。
- [19] 陈旭麓《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6页。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19、332、333、354、406、406、419、383~384页。
- [29] 《申报》,1912年8月29日,陈锡祺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

- 册), 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第 714 页。
- [28] [29] [30] [42] [43] [45] [52] [53] [54] [55] [56]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第 29-34、66、69、82、92、97、218、227、247、287、285 页。
- [57] 《孙中山全集》第八卷,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第 443 页。
- [58]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2 年版, 第六十九回, 第 61 页。
- [59] [63] [68] 陶菊隐《袁世凯演义》,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第 425、426、516 页。
- [64] 杨云慧《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65 页。
- [65] 《南京留守黄兴任命令》, 朱宗震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5 页。
- [66] [67] [68] [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 545、485、485、51 页。
- [74]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 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第 851 页。王统即王统一。
- [76] 杨思义《二次革命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 《文史资料选辑》98 辑,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127 页。
- [77] 茅家琦《孙中山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490 页。
- [88] 李新、李宗一《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 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第 637 页。
- [99] 《致袁世凯电》, 《蔡松坡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376 页。
- [50] 由云龙《护国史稿》, 《近代史资料》, 1957 年第 4 期。
- [51] 黄兴《致全国各地讨袁电》, 《黄兴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427 页。
- [57] 《为袁逆取消帝制致各省通电》, 前云南省都督府秘书厅编辑:《会泽首义文牍》上册, 云南图书馆, 1917 年发行, 第 45 页。
- [59] 胡汉民《总理全集》第二集, 上海民智书局, 1930 年版, 第 234 页。
- [60]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第 297 页。
- [61]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006 页。
- [62] 《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 《民立报》, 1912 年 1 月 25 日。
- [63]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 2 卷,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6 页。
- [64] 高叔平《蔡元培全集》第 7 卷,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第 360 页。
- [65] 田正平《教育制度的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2 年第 1 期。
- [66] [67]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 《独秀文存》,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49、55 页。
- [68] 《吴虞》, 见 Howard Boorman 编的《民国人物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1968.)

The Division of the Abroad Students Group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of Saving the Nation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N Yu^{1,2}

(1. Research Center of Abroad Students and Modern China,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008, China;

2. Huaian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of Information, Huaian 223003, China)

Key Words: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broad students groups; division; exploration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broad students pursued different political directions to explore the path of saving the nation. In general, they experienced the following stages: the limited loyalty to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period of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he divided opinion between constitu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and the desertation of Qing dynasty after the breaking up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complicated domestic environment, returned students strived to maintain and extend the fruits of revolu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nging of reality and their different resources. After Yuan Shikai's restoration of monarchy, most of the returned students insisted in Republics and put an end to Yuan Shikai's regim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ing the politics of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abroad students made different efforts. Some of them devo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y, saving the country by engaging in industry, some of them dedicated themselves to education, pushing forward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system, some others contemplated the problems of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China to anticipate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round the time of May 4th Movement of 1919).

责任编辑: 周 棉